

书间道

深微未必人咸识

汪涌豪

面对作家李敬泽，许多人常生出一种无力感。他们看得懂他写的每一个字，就是不能听懂他说什么。由于习惯于追问每一种确定性，他们不知该如何评说这样天马行空的窃窃表达。结果围绕他展开的评论，大多是由烟斗、围巾带出的他的潇洒，还有他的爱逛店和像明星。我不相信他乐见这样的评论，尤其对这本薄薄的《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他们还这样。

与《青鸟故事集》一样，此书仍被他写成了“四不像”，但认真读过，会发现并非漫散无归，毋宁说服从于相同的理念，有着可以识别的共通的情绪基调。这种基调多元复合，很难确切指出。如果一定要有着落，其中至少有对人所熟悉的各种论坛、讲座或发布会的厌倦，以及自己不得不有所回应的疲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一次次不受控制地“开小差”，其实是被各种思绪引开去。当记者们自以为已将他的意见完整地写入了新闻稿，这样的“灵魂出走”适足构成一种切要的提醒，告诉人有时广庭之义真的难抵促膝之谈，更不用说许多时候，可以语达的是意念中的粗率，只能神通的才是真思想的精华。至于那些不期相碰的灵感劈面而来，又悄然隐去，原不求人理解。用他的话，是自己与“身体里的那一群人”的默契神会。在这种默契神会中，他难免因共通的趣味得到确认而“低回伤旧事，万感付琵琶”，复常由深彻的失望反激出不忍放弃的坚持，最终悉归于热切的期待，期待能与更多人共同为这个时代将要到来的灵魂，存一卷清虚，积十分骚雅。这样的情形，又有点像古人说的“深微未必人咸识，默守心期待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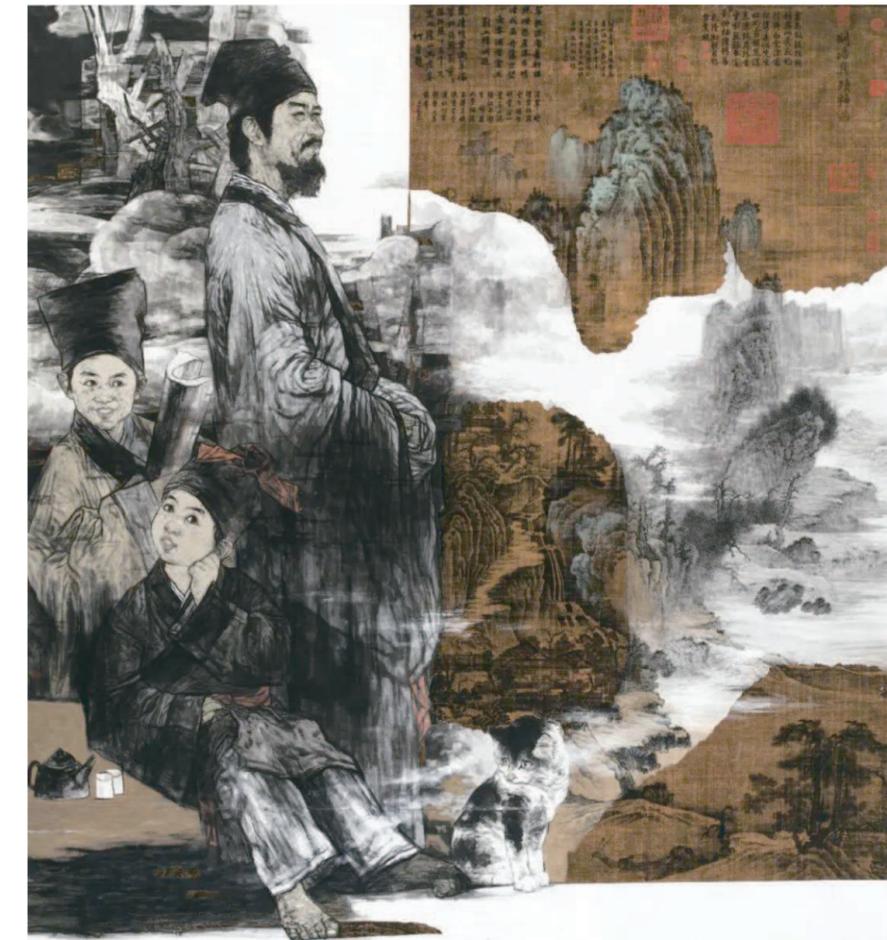
显然，这样的感怀需要一个更宏大的主场安顿。为此，他不循旧径与管理，用别一种眼光审视当下的文学，竭尽努力去照见它们的背面，揭出有时连作者都未必意识到的它们的底里。并且不是就事论事的那种，是不避繁复，多方照察。特别需要表出的是，这种眼光还不总是来自文学本身，更多时候，是来自腹笥充盈造成的他对现实人事的整体性思考。具体地说，他不满足于历史的考察常被碎片化为各种不相关的亚领域，而总是想着尽可能地让这些碎片拼合起来，以开显某种隐含的“总体性”，即一种堪称“壮阔的联系”、“隐秘的结构”和“人世间的命运”，为其不但能裸出物的本质，还能赋予人真的认知。基于此，他特别推崇费弗尔以下“年鉴学派”四代人反对将日常视为非历史的主张，尤其佩服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为使许多文学现象的突变、悖乱能被看成是整体性的社会变革的结果，他将许多时间投入到一般作家、批评家甚少留意的博物学与考古学，甚至突破中西的畛域，关注中外古典学乃至中西交通史这样冷僻的学问，以为要真的达到总体性的认知，非重视人性的各种变态和事物的各种面相不可。这使得他的写作虽多片段拼接，仍不乏“全史”的大格局。他让许多彼此陌生龃龉的人事在不同的密室游走，并悄无声息地追踪其灵魂的喘息，然后不动声色地告诉你，它们其实面目相似，甚至还有着某种不可言状的神秘的联系。

所以不是炫博，更非骸骨迷恋。他用“会饮”为书题，是认定柏拉图、色诺芬等古希腊先哲对爱与美的讨论不惟充满着机辩和智趣，实包含着对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的重视。他们具有哲学家、政治家、悲剧诗人等多种身份，更有受智术学派影响的剧作家甚至医生，虽多高谈阔论，但凝神之所居，所省察的无不是永归一己所有的诗意的人生。他们尽一切可能地让美成为自己的属性，然后藉此激发更广阔的爱和更广大的思考，这不能不让他想到自己读过太多的先秦诸子，还有唐宋以降历代笔记小说。为着具有同样整合的视野，并同样向纷乱的世界投去深情的一瞥，他认定希腊人的雅集高会，是可以和先秦诸子的赋诗言志拍肩而笑，并相视莫逆的。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看先秦诸子，虽常奔走谋食，并时时“有失职”的恐慌，但言行举止并未因此变得庸近或俗滥，对天下的关心要他们时刻砥砺自己的才智，他们也真淬炼出精辟的思想，并口横海市，舌卷楼台，赢得了君王的敬重和青史的令名。且沾溉后来，既深且广，以至如章太炎

所说，“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这些后来者一如自己的前辈，常常振衣高冈，酹酒庙堂，所谈大可悟道，小可观物，所著经门人弟子记录，居然也能成为“格致之全书”。后世轻薄或以其人非能爱智，其书更遑远经史，但察其关注舆地、兵事、农桑、钱谷及一切人事物理，由形而下的器与术一力上溯，是欲将明物与明道融为一体。故魏晋以降，经学与子学已相融通；唐宋以来，时人虽仍高看柱国勋臣，更乐意做“博明万事”的博雅君子。这样的缘故，今人读其书，包括由此衍展出的笔记小说，得以实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所仰赖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是怎样受到时代的规定，并深刻塑造了后来的历史。

正是确认今人的言笑歌哭其实都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所以在关注纯文学同时，他时时旁及先秦诸子和唐宋笔记小说等杂文学传统，不仅精读《诗经》，甚至还想复活子部。与晚清《钦定学堂章程》保留诸子学科不同，民国《大学规程》已以哲学替代之，致有两千年历史的诸子学就此隐退。尽管其理懿辞雅，事履言练，与夫析理之巧与博喻之富，足称古人理性思维的标杆，其言深义奥，语质文钝，不仅不为障碍，更助人“入道见志”，洋溢着浓郁的诗性，比居于正统的王官之学更具现代性，更有与现代表文化相融通的潜质。作者是真体认到了这一点，所以对由其揭出的那些古老而基本的理论、秩序抱持着一种真诚的敬畏，认定从它们出发也就是从文明的上游出发，也就有可能理解本民族的真历史和真精神。他并相信历史有着某种复归与循环的动能，传统依然活在人身上，它从内部和根本处照亮并指引着人，让人在变得刚健丰沛的同时，获得更广阔视野，并得以周知当下种种复杂的世相。这对理解文学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关注长时段中的边缘与碎片，会成为他当然的叙事策略。



选自中国美术馆「中原风·黄河魂——河南省美术作品展」 荆浩的北派山水（国画）贾发军

我七岁时，就读于北京海淀区建设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某天放学回家，我对父亲说，爸，我当上了主席。

爸吓了一大跳，说，什么……主席？

我说，班主席。

说起来，“主席”这个词，是中国特产。古时没桌椅，老祖宗席地而坐，大约到了唐代，才出现了真正的椅子。

席地有讲究，不是没章法的胡乱坐。先在房间里铺上和地面等大的席子，这片席子叫“筵”。再给每个人坐的人，摆上小垫子，称为“席”。古人进屋，先脱鞋，再走过筵，最后坐在席上。席垫有很多张，并非你想坐哪儿就能随意坐。客人在客座，主人的长辈独自坐在主家专席上，称为“主席”。

“主席”是国粹，由中国人发明并流传至世界各地，清末又由留学生引回中国。西方人似没有席地而坐的习俗（私下觉得他们的地理位置多寒凉，坐地上易受寒邪导致腹痛），逢宴请或开会，主持人坐高背大椅，客人屈居长凳。

我的班主任名为白玉琴。一年级第一学期，我操行评定为“优”，当选三好学生，白老师随即宣布我为班主席。班主席是干什么用的？我很恍惚。在这之前，班上并无这个职务。估计

白老师在第一个学期中，暗中观察学生，未曾轻易委任。

我很茫然地说，我不会当班主席，不知道该怎么当。

白老师说，不用你干什么，每天上课时，铃声响，老师走进教室，你喊“起立”。再有，你必须得好好学习，最好是全班第一。他还有一些小事儿……

学习，对我来说不算太难，其他小事儿也不是问题。最难的是班主席要天天喊“起立”。白老师没教我怎样能发出“起立”的指令，真真难煞人。

“起立”就是每堂课开启时，老师走进教室，班主席发出“起立”号令，全班同学站起身来，向老师行注目礼。

最喜欢准时踩着铃声进教室的老师。铃声起，老师脚尖正好迈进教室门槛（教室其实没门槛。我指的是敞开的教室门和门框中假想的那条线），

或许，对着当下文坛动辄有杰作问世的荣景，《会饮记》留给写作者的启示是这样的：世界何其复杂，人的精神更难描画。与其追求显在的线性联系，不如遵循开放性原则，把文章写杂，写得不像，把更多片段、镜头连接成更具隐含性的故事，以曲尽生活立体、多元和网状的真相，这样或许更能彰显因陌生感带出的历史的弹性与张力。与此同时，写作者需要广博地学习，既周知天下万物，又能放空自己，而永远不要以主位来限指对象，成为既有“前见”与科套的囚徒。因为你并非全知全能，更无力驾驭全局，不如让文字顺着生活的逻辑，显示它自己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呈现它自己的意思和无意思，以及它大致的轮廓甚至杳无边际。

这个过程非常烧脑，所以能想象作者写每一篇时，一定为如何安顿无管控的思绪而耗尽心力。在历史巨大的力量的牵扯下，他哪里有信马由缰的潇洒，有的只是被裹挟着走的不自在和不自由吧。但这种不自在和不自由，才让气纵横的作者变得谨慎而谦虚了，也因此气定神闲起来。由此，笔下澜翻的似小实大的恢弘叙事，尽管以他向往的总体的思考衡量还是零碎的，但终究给习惯于常规认知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更让追求完满真知的他得以不断地推敲和确认了自己，在上述种种景况的厌倦和疲累中救出了自己。这个过程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若强为之说，近于波兰尼说的“默会之知”，已被他在生活和写作中认真地践行，以致成为一种与显性知识相对的缄默内隐的德性。

2020年冬天，因缘际会，我去了一次徐州。在特殊的2020年，我只出门了三次。在东京的时候，见到了正在访学的南师大教师朱婧。当时疫情还没有来，我们毫无负担地聊了聊学业、聊了聊生活，还去横滨看了一场消防演习，现在想来真有些无厘头。朱婧回南京后，有天突然给我寄了四张卡片，是动画《大闹天宫》的插图，说是在南京一家书店看到的，可能是蒙文。我给研究蒙古学的朋友看，他说这不是蒙文。字符上有很多圈圈，我又问是不是缅甸文，但是没有得到回答，这件事就搁下了。2020年年末，在徐州见到了徐工院的青年教师赵哲博士，她现在在做一些港台文学研究，本科却学的是尼泊尔语。赵哲一眼就认出，这是僧伽罗语。真让人惊叹。

《西游记》与斯里兰卡渊源很深，以这样当代风格的图像成功地进行文化输出，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光荣。许多人都谈到过《大唐西域记》中的狮子国就是“僧伽罗”，也就是斯里兰卡古代的名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狮子国、师子洲。如今，在斯里兰卡西北角，有一个突出海上的狭长岛叫马纳尔岛，正对着班本岛的东，当中有一条48公里的海峡，名叫“亚当桥”。在印度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中，王子罗摩的妻子被魔鬼头子掳走，王子为了救妻，请来了一只名叫“哈奴曼”的神猴，几天时间在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峡间架一座浮桥，这座桥就是亚当桥。“哈奴曼”大家都很熟悉，胡适认为是孙悟空的原型。1923年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胡适列举了《罗摩衍那》哈奴曼的种种神通：“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但我曾不同意，鲁迅认为孙悟空就是中国的猴子。《西游记》中的朱紫国一难，与《罗摩衍那》中的救妻故事是很相似的，神猴所起到的救援力量、救援技能也很相似。足见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力量。

另一些不成气候、却让我不断感到惊喜的发现，就是关于《西游记》对日本的影响。学界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少，仍有难以成文的边角料信息很少被谈论到。如大正九年（1920），中岛茂一曾经翻译过《西游记》，署名中岛孤岛。中岛孤岛1878年生，是日本的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1899年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毕业。这个译本中的观音图像，长得很像圣母玛利亚。据说，“圣母玛利亚”在日语里翻译为“マリヤ观音”，就是“玛利亚观音”。江户幕府时代有禁佛禁令，只能信佛教。于是天主教徒借观音来代替圣母玛利亚崇拜，久而久之（转引自“文物医院”）。幕府禁教非常严格，远藤周作有一部小说《沉默》说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后来还被翻拍成电影，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映。在2019年华东师大中文系主办的西游记高峰论坛上，我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晓芳博士，她曾研究《西游记》英译史，关注到了晚清天主教汉文护教文献中出现的“西游记”元素，例如有些佛教神像图像中会出现“鸽子”等天主教的符号。在中国台湾地区，“玛利亚观音”的图像也很多。

在台北求学时，我发现当地中国文学所的《西游记》研究是非常传统的。而日据时期，亦有《西游记》传播改编的史料。如1942年，西川满曾以“刘氏密”为笔名在《国语新闻》上连载《西游记》。西川满有两次翻译《西游记》的经历，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改写。1942年，他翻译的《西游记》5卷，曾引发热卖。战后通货膨胀，中山省三郎介绍八云书店给当时经济拮据的西川满，再次出版《西游记》，此次是3卷本，由宫田弥太郎绘制封面。上世纪50年代，这套3卷本《西游记》又在日本新小说社再版。我曾收一本昭和43年（1968）嵯梨花所画的《西游记》。她和手工书之魔西川满多有合作。1987年，西川满的《女怪西游记》，也是由嵯梨花画封面，发

重探《西游记》的域外传播

张怡微

行量非常少。秋天的时候，百城堂书店林汉章先生替我找到了一本。

最奇特的发现，要属一张杂志插页。1916年，日本发行《飞行少年》杂志，鼓舞热血少年展开飞行扩张的决心。自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美、英、法、德等工业强国都开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探索之路。作为后进国家的日本先后派遣军人前往欧美诸国学习航空技术，并积极购买航空器材回国研究。据维基百科上关于日本航空历史的大事年表记载，“1910年12月14日，日本陆军的日野熊藏大尉驾驶着德国制的格拉德单翼机完成了在日本上空的首次飞行。”这是日本航空之梦开始之原点。和田博文有一本《飞行之梦 1873-1945》，书中提到一个人，叫尾崎行辉，1888年生，是一个飞行器工程师。他曾在《毕业飞行感想》一文中，提到自己的偶像，是踩着筋斗云的孙悟空。在那个年代，飞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据说1914年以前，英国飞行员上天后的平均寿命是七天。林徽因的《哭三弟恒》、白先勇的《一把青》都曾描写到中国飞行历史的严峻。1920年，这本《飞行少年》杂志第6卷发行，配套印刷了一张《孙悟空西游记双六》的大图，图上有许多战场画面，与中国猴模仿两宋僧侣行者的锦布直裰穿着不同，图中猴子更像是武士战阵铠甲的装束，也没有什么虎皮裙。猴子是我们的猴子，但衣服不是我们的衣服。

学海无涯，在《西游记》研究界，我是个学生。重探《西游记》的域外传播的过程，令我的2020年变得不那么枯燥难捱。是《西游记》让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学习了越来越多的知识。我想，这也是学习文学最愉悦的收获。

写于2020年岁末

九千声“起立”

毕淑敏

我不失时机地大喊“起立”！全班同学噤声站起，齐声喊道，老师好！老师颌首，回复：同学们好！请坐下……大家又噤声坐下，任务完成。

之所以反复用“噤声”这个词，概因那个年代的课桌椅都是实木，年久失修，动辄呻吟不止。

有时候，老师会提前到教室，成人臀挤在孩童的小座椅上和大伙儿聊天……上课铃响，老师并不马上起身走向讲台，而是平易近人地不慌不忙继续拉家常，非要把半截话吐尽，才动身走向讲台。这时我就很吃瘪，分寸感难以把握。喊早了“起立”，老师意犹未尽，话才说一半儿，被迫起身，悻悻地剜我一眼；喊晚了，老师已一个箭步冲上讲台，大家还懒散呆坐。老师感觉同学们不够尊崇，也易迁怒于我。

所以，每逢课间，同学们利用点

师根本就没来呢，瞎指挥，乱发命令，害得腿都酸了……我百口莫辩呆呆站着，四周包裹着粘腻的凝滞。我只好开导自己：老师不进来，我有什么法子？看有谁忍不住噗通坐下，我假装没看见。反正只要不是天塌地陷，老师总会像暴风雨后的云霞一般再升起……

幸好这种糟心时刻并不太多，一年中的频率不超过五次。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共当过十一个学期的班主席。按每天六节课计算，一年会喊近两千次起立。刨去假期和自习体育课程，整个小学期间加起来，累计发出超过九千次“起立”的口令。

我至今不知老师选拔我做班主席的标准是什么。

终于找到了机会问她。白玉琴老师年过八十，我也六十多岁了，和同学们到她家做客。老人家忙着煎炒烹炸一道道小菜，好像我们还是当年的孩童，而她正值风华正茂的壮年。我嘴里一边嚼着红烧鱼块，一边思付着在某个合适空档，插嘴问，白老师，您当年为什么在全班孩子里选我做班主席？

那鱼刺多，生怕被卡住，在老师面前出丑，终于没能问出口。心底里也怕白老师说，为什么啊？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儿啦！

